



曲阳白石造像研究

冯贺军著

紫禁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曲阳白石造像研究 / 冯贺军著. — 北京: 紫禁城出版社,
2005.9

ISBN 7-80047-509-3

I 曲… II 冯… III 佛像—石刻造像—研究—曲阳县
IV.K879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55109 号

曲阳白石造像研究

著 者: 冯贺军

摄 影: 赵 山等

责任编辑:
万 钧

版式设计:

封面设计: 郑志标

出版发行: 紫禁城出版社 (北京景山前街故宫博物院內)

制 版: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

印 刷: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

字 数: 120 千

印 张: 16.5

图 版: 335 幅

印 次: 200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3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80047-509-3/k · 250

定 价: 90.00 元

曲阳白石造像研究

冯贺军 著

紫禁城出版社

目 录



第一章 绪论	007
一 发现与研究	008
二 修德寺名称问题	012
三 造像被毁原因	014
四 渊源与分期	017
1 渊源	017
2 分期	021
第二章 发愿文	027
一 上曲阳沿革	028
二 真王五年	031
三 造像时间与佛教节日	034
1 十斋日	034
2 佛教节日	036
四 术语释义	038
1 邑义	038
2 维那	039
3 道人	046
4 内亲、孃、娘	049
5 渤海大王	052
第三章 信仰与造像	057
一 观音信仰与造像	058
1 观音经典与信仰	058
2 造像数量与发愿文内容分析	059
3 造像的发展与演变	066
二 弥勒信仰与造像	070
1 弥勒经典与信仰	070
2 造像数量、渊源与演变	070
3 上生与下生	078

第四章 思惟造像	081
一 曲阳白石造像中的思惟像	082
1 太子思惟像	084
2 龙树思惟像	085
3 思惟与未名思惟像	086
二 思惟像的特征	089
三 思惟像的再认识	093
第五章 基座类型与题材	097
一 插合式基座	098
二 连体式基座	099
1 素面基座	100
2 浮雕基座	100
3 线刻与彩绘基座	102
三 基座的题材	102
1 北魏至东魏时期	102
2 北齐时期	103
3 隋唐时期	113
附录一 从七帝寺看定州佛教	118
一 七帝寺沿革	118
二 七帝寺与定州佛教	123
附录二 龙兴寺、万佛寺与曲阳造像	130
一 三地造像的特点	130
1 青州龙兴寺石造像	130
2 成都万佛寺石造像	134
3 曲阳白石造像	136
二 三地造像的相互关系	138

附录三 发愿文总录 140

 一 北魏 143

 二 东魏 149

 三 北齐 169

 四 隋 219

 五 唐 254

附录四 主要参考文献 258

后 记 262





第一章 绪论



一 发现与研究

河北曲阳白石造像发现出于偶然。1953年10月19日,曲阳县南关农民在挖地窖时发现了石佛像。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委派罗福颐(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)、李锡经(北京历史博物馆)、郑珉中(故宫博物院)在河北省文化局有关同志协助下,于1953年冬至1954年春对此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,共出土造像及残件2000余件。造像埋藏在早于五代的佛殿遗址下面,在正殿月台西北与东北,共发现甲、乙两个埋藏坑。甲坑为方形,“南北长2.5米,东西宽2.6米。在坑深1.8至2.6米之处,全部散乱堆集佛像,小像多集中上面,大像多集中在下面,一看就是当时先掘一正方坑,而后将已毁石造像散乱掷进去的。在这个坑里,掘出了2000多件残石造像……该坑中除石造像外,并无他物,竟连半块砖瓦瓷片都未发现。这无疑是由于埋佛的时候系在最下层建筑之前,也就是至少要早到五代以前”^①。乙坑“深1.75米;仅在距砖面50厘米深处得石佛身一,在1.55米深处得石佛座2个,1.6米深处得石佛座1个。坑形东、西、南三面略成方形,仅北面突出一部,全坑横断面呈马蹄形,东西两侧方向与砖路恰成垂直。这坑内除发现仅有的一小块内灰外青的釉缸胎的唐代瓷片外,只有少许沟纹砖和一些零碎小瓦片”^②。“埋着石造像的两坑均在最下层建筑的下面,一个是丝毫未动,一个则仅存3个佛座和1个佛身。这可能是在建筑当时一个被发现而遭掘出,一个则未被发现。由此可以推知,当唐末五代之时,该批佛像早已埋在下面而无人知晓”^③。这一推断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,因为在修德寺遗址中,有些柱础是由北齐的大佛身改造的,可见乙坑的佛像,在当时已经被当成石材加以利用了。佛像清理完毕之前,为参加在北京举办的全国基本建设出土文物展览,先行在已出土的文物中遴选出63件,运往北京,其余的继续编号整理。当时的发掘仅限于遗址附近,由于在修德寺塔四周和寺西高台附近,都曾发现过佛像,所以发掘者推测,在其周围可能还有出土的希望。笔者曾进行实地调查,当地居

① 李锡经:《河北曲阳县修德寺遗址发掘记》页43,《考古通讯》1955年第3期。

② 同①。

③ 同①。

民也有类似的说法，只是原遗址周围皆为民房，大规模调查十分困难。由于佛像损坏严重，河北省文化局与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达成协议，将所有发掘品全部运往北京进行粘接修对。此后，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将大部分造像拨交河北省博物馆，其余的归属故宫博物院、中国历史博物馆（今中国国家博物馆）、辽宁省博物馆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、中国对外文化委员会等单位。

最先报道曲阳发现白石造像的是《河北日报》，时间为1953年12月4日。《文物参考资料》1954年第1期以《河北曲阳城西南发现大批石造像》为题，转载了《河北日报》刊发的消息。宿白在《展览会中的一部分美术史料》（《文物参考资料》1954年第9期）魏晋南北朝佛教造像中曾有曲阳修德寺条，专门论述此批造像在中国佛教造像史上的重要意义。在对此批白石造像发掘清理后，两位发掘者罗福颐、李锡经分别发表了《河北曲阳县出土石像清理工作简报》、《河北曲阳县修德寺遗址发掘记》两文，均刊登在《考古通讯》1955年第3期上。罗文对造像进行了初步归类与统计，并对造像止于天宝九年（750年）的原因进行了探讨。李文则对考古过程、坑址大小及形状、修德寺遗址内涵与出土的相关文物进行了论述。两篇文章为我们了解有关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。

首先进行系统研究的是杨伯达。在此批造像入存故宫博物院后，杨伯达对其进行了全面考察，相继发表了《曲阳修德寺出土纪年造像的艺术风格与特征》^①、《东魏石造像上的一幅思维画像》^②、《曲阳修德寺遗址石造像出土三十周年有感》^③等文章，并辑成《埋もれた中国石仏の研究——河北曲阳出土の白玉像と编年铭文》一书^④。这些论著全面分析了曲阳白石造像产生的时代背景，从北魏晚期、东魏、北齐、隋、唐等不同时期纪年造像形象特征入手，对各个时期造像进行了细致的分析，提出了曲阳纪年造像在题材与信仰上，与龙门石窟是一致的，而在造像手法上，虽与龙门、玉函山、云门山、驼山保持一定的联系，但主要是

① 杨伯达：《曲阳修德寺出土纪年造像的艺术风格与特征》页43—60，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1960年总2期。

② 杨伯达：《东魏石造像上的一幅思维画像》页18—21接34，《文物》1960年第7期。

③ 杨伯达（笔名范登）：《曲阳修德寺遗址石造像出土三十周年有感》页43—47，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1984年第4期。

④ 杨伯达著，松原三郎译：《埋もれた中国石仏の研究——河北曲阳出土の白玉像と编年铭文》，东京艺术，1985年。



图1 东魏武定元年王女仁造佛像

以自己的地方特色为主，平民造像倾向明显。并对个别案例如东魏菩萨像背后的思惟画像进行了研究。针对李静杰、田军将有双年款的王女仁造佛像（图1）的制作时间定为武定元年（543年），杨伯达又撰写了《武定元年王仁兴“心造记”铭考》^{〔1〕}一文，认为李、田文章将“心造记”主的名字定为“女仁”是不准确的，“心造”系佛语，为“为心所生”之意，并坚持“原定正光元年（520年）王仁兴父母造释迦倚坐像而非武定元年王仁兴所造的鉴定结论。王仁兴仅撰‘心造记’文，并雇工将78字之铭文（附录三35）镌刻于造像背光之一角，流传至今，成为我们判断此造像绝对年代的重要依据，而此像还具有作为鉴定北魏晚期佛像的标准器的重要价值”。

日本学者松原三郎在《增订中国仏教彫刻史研究》中对北齐定县样式白玉像进行了研究，并在其所译《埋もれた中国石仏の研究——河北曲阳出土の白玉像と编年铭文》一书的解题中对曲阳白石造像在广泛意义上进行了探讨，这些都对曲阳白石造像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李静杰、田军《定州系白石佛像研究》^{〔2〕}一文，将曲阳白石造像放入定州系

〔1〕 杨伯达：《武定元年王仁兴“心造记”铭考》页1—3，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2001年第4期。

〔2〕 李静杰、田军：《定州系白石佛像研究》页66—84，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1999年第3期。

中加以研究。所谓定州系白石佛像,是指流行于定州地区(外延北到河北易县,南至临漳,西达山西昔阳,东临山东博兴)的佛教造像体系。盛行于北魏至隋唐间,曲阳为其造像中心。它以白石为材质,浮雕与透雕相结合为其主要技法,佛像形体相对较小。这一风格,迥异于其他地区造像,成为一支独具特色的造像系统,在中国佛教造像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关于定州系问题,日本学者松原三郎在《增订中国仏教彫刻史研究》中提出了定县样式,但由于材料上的限制,论证尚不系统。李、田之文以曲阳白石造像为中心,参考国内外相关资料,对其范围、佛像造型演化、渊源与流变、题材与信仰等方面进行了论述,是迄今全面论述定州白石造像的高质量论文。李静杰《定州白石佛像艺术中的半跏思惟像》^{〔1〕}一文,专门论述了定州白石造像中颇具特色的半跏思惟像,指出其题材为太子思惟,发愿文中提到的龙树,系指造像中两侧刻有盘龙的树,与弥勒菩萨无关。

胡国强、冯贺军《“杨天仁等二百人造白石弥勒像”铭文小考》^{〔2〕}一文,从真王五年、上曲阳、维那、弥勒等四个方面,对此件造像进行了认真、细致地分析。胡国强《刘氏家族造思惟像年代及有关北朝思惟像问题》^{〔3〕},根据残存的“朔卅日甲午”及造像风格判定此件作品的年代为北齐天保八年(557年)十二月卅日。胡国强《两件北魏“真王五年”造像铭考》^{〔4〕},通过上海博物馆及海外所藏有关真王年款造像,进一步论证真王五年为528年。

李玉珉《河北早期的佛教造像——十六国和北魏时期》^{〔5〕}一文,虽非是直接研究曲阳白石造像的专论,但其涉及北魏时期释迦、弥勒、释迦多宝、观音等题材以及这些造像信仰背景、源流、特征与演变过程等问题,并附有75则造像资料,这对我们从广义范畴上理解曲阳白石造像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。

〔1〕 李静杰:《定州白石佛像艺术中的半跏思惟像》页34—36,《收藏家》1998年第3期。

〔2〕 胡国强、冯贺军:《“杨天仁等二百人造白石弥勒像”铭文小考》页4—8,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2001年第4期。

〔3〕 胡国强:《刘氏家族造思惟像年代及有关北朝思惟像问题》页75—81,《文物》2003年第5期。

〔4〕 胡国强:《两件北魏“真王五年”造像铭考》页70—73,《文物》2004年第9期。

〔5〕 李玉珉:《河北早期的佛教造像——十六国和北魏时期》页1—80,《故宫学术季刊》第一一卷,第四期。

二 修德寺名称问题

修德寺与曲阳白石造像没有内在联系，称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白石造像，并不意味着此批造像最初属于修德寺。由于近年来许多出土佛像均与原寺院有关，故以修德寺名之，常引起人们的误会。据康熙年间编纂的《曲阳县新志》记载，曲阳城内较早的寺院有二：一为永宁寺，在县城东北，唐天宝年（742—756年）建。一为大明禅寺，在县城西南，宋元祐间（1086—1094年）建。城外较早的有东关城东村兴福寺，汉明帝时建。大兴寺在嘉山东，唐天宝年建。修德寺在城外南关，宋元祐间建，见诸县志。修德寺塔上的三块碑文^①，为我们提供了修德寺建造年代之实物证据。曲阳纪年造像中最晚者为天宝九年，故此批造像与修德寺本身无关。近年，修德寺塔地宫出土舍利塔下铭1件，其铭云：“维大隋仁寿元年（601年）岁次辛酉十月辛酉十五日乙丑，皇帝普为一切法界幽显生灵，谨于定州恒阳县恒岳寺，奉安舍利，敬造灵塔。愿太祖武元皇帝、元明皇后、皇帝、皇后、皇太子、诸王子孙等并内外群官，爰及民庶，六道三涂，人非人等，生生世世，值佛闻法，同升妙果。舍利塔下铭。”^②由此舍利塔下铭可以认为，在隋朝仁寿年间（601—604年），修德寺的前身为恒岳寺。

有关恒岳寺的记载并不甚多，目前所知它是隋朝第一批颁赐舍利塔的30个寺院之一。隋文帝立舍利塔诏云：

请沙门三十人谕解法相兼堪宣导者，各将侍者二人并散官各一人，熏陆香一百二十斤，马五匹，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诸州起塔。其未注寺者，就有山水寺所，起塔依前山。旧无山者于当州内清静处建立其塔。所司造样

① 罗福颐：《河北曲阳县出土石像清理工作简报》页35—36，《考古通讯》1955年第3期。第一块云：“重修塔。维大宋天禧三年（1019年）四月八日，定州曲阳县曲阳乡赵常村都维那高□□等，□□本县修德寺舍利塔弟曾级宝塔一级邑众竖名永久，其院地四百亩。李绚……讲经论修舍利塔主沙门志因，永宁寺主广隆施地造塔。”第二块云：“惟大宋天禧三年四月八日，定州曲阳县曲阳乡北相如村维那头李守谦合家修宝塔一级，弟守岩、守一……匠人刘中、陈大中。”第三块云：“惟大宋天禧三年四月八日，定州曲阳县从化乡水门岩等村邑众共修舍利塔一级，善友芳名刊之于后。县长刘德元，邑正张审斌，邑录杜彦斌，邑人刘继荣……”

② 此内容承河北曲阳文保所王丽敏所长见告，在此表示谢意。

送往当州。僧多者三百六十人，其次二百四十人，其次一百二十人，若僧少者尽见。僧为朕、皇后、太子广、诸王子孙等，及内外官人，一切民庶，幽显生灵，各七日行道并忏悔。起行道日打刹，莫问同州异州，任人布施；钱限止十文已下，不得过十文。所施之钱以供营塔。若少不充役正丁及用库物。率土诸州僧尼，普为舍利设斋，限十月十五日午时，同下入石函。总管刺史以下，县尉已上，息军机停常务七日，专检校行道及打刹等事。务尽诚敬副朕意焉。主者施行。仁寿元年六月十三日内史令豫章王臣暕宣。⁽¹⁾

王邵《舍利感应记》：

皇帝于是亲以七宝箱，奉三十舍利，自内而出，置于御座之案，与诸沙门烧香礼拜，愿弟子常以正法护持三宝，救度一切众生。乃取金瓶琉璃各三十，以琉璃盛金瓶，置舍利于其内，熏陆香为泥，涂其盖而印之。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于铜函石函，一时起塔。诸沙门各以精勤，奉舍利而行。初入州境，先令家家洒扫，覆诸秽恶。道俗士女，倾城远迎。总管刺史诸官人，夹路步引，四部大众，容仪齐肃。共以宝盖幡幢华台像辇佛帐佛舆香山香钵种种音乐，尽来供养，各执香华，或烧或散，围绕赞贝，梵音和雅，依《阿含经》舍利入拘尸那城法。远近翕然，云蒸雾会；虽盲聋老病，莫不匍匐而至焉。⁽²⁾

前来定州恒岳寺送舍利者为慧海。

释慧海，张氏，河东虞乡人。久积闻熏，早成慧力，年在童齿，德类老成。……年至十四，遂落发染衣，为沙门大昭玄统昙延法师弟子也……大隋御宇，方践京师，帝姊城安长公主，有知人之鉴，钦其德望，为立伽

(1) (唐)道宣：《广弘明集》卷一七；《大正藏》卷五二，页213中。

(2) 同(1)，页213下—214上。

蓝，遂受以居之，今之静法寺是也。课业四部，三学兼宏，门徒济济，于今传美。未爱重定行，不好讲说，緘默自修，唯道是务，而无恃声望，不言加饰，直心道场于斯人矣。仁寿已前，文帝频顾玺书，分布舍利，每感异祥，恒有延誉之美。故《感应传》云：“初，海造塔于定州恒岳寺，塔基之左有滢，名曰龙渊，其水不流，深湛悬岸。及将安置，即扬涛。沸涌激注，通于川陆。”……后又送舍利于熊州十善寺……大业二年（606年）五月二十七日，卒于本寺，春秋五十有七。……弟子钦崇德范，收骨而建塔于终南之峰，即至相之前岭也。^{〔1〕}

据《历代三宝记》卷一二记载，隋开皇元年（581年）闰三月，曾下诏于五岳之下各立一寺。《法苑珠林》卷一百也有“隋文帝开皇三年周朝废寺，咸乃兴立之。名山之下，各立为寺”的记载。曲阳在清朝以前为北岳所在地，五岳之下各立寺院，北岳所立者即恒岳寺。

在曲阳白石造像发愿文中，共涉及寺院8处，东魏有追恩寺、高仲景寺，北齐有庄严寺、忠明寺、刘懃寺、高阳公寺、苕湟寺、张市寺。这批造像最初应与这些寺院有密切联系，只不过这些寺院规模很小，《曲阳县新志》、《定州志》等志书中不见著录。它们与造像之间的具体情况，现在还难以骤下结论。

三 造像被毁原因

中国古代佛教造像大规模地被毁坏，主要是因为佛教势力日大，皇权受到威胁，众多僧侣不耕而食，不织而衣，国家经济日渐衰退，统治者不得不采取灭法毁佛的极端措施，以遏制佛教之膨胀发展。中国佛教史上最为惨烈的打击佛教活动为“三武一宗”灭佛事件。

“三武一宗”灭佛事件，系指北魏太武帝、北周武帝、唐武宗与五代后周世宗打击佛教、毁坏佛像事件。佛教自异域传入中土，兴佛与灭佛之争便一直没有间断，特别是随着佛教势力的扩张，崇佛者日众，排除之议就愈为强烈。北魏太武帝

〔1〕（唐）道宣：《高僧传二集》卷一三，页6—7，光绪十六年（1890年）江北刻经处。

即位之初也信奉佛教，礼敬沙门。后听信寇谦之、崔浩之说，渐弃佛法，改信道教，欲借中国传统之道教，排斥佛教。太平真君五年（444年），太武帝下诏曰：

沙门之徒，假西戎虚诞，生致妖孽，非所以壹齐政化，布淳德于天下也。自王公已下至于庶人，有私养沙门、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，皆遣诣官曹，不得容匿。限今年二月十五日，过期不出，师巫、沙门身死，主人门诛。⁽¹⁾

而灭佛的直接原因则是卢水胡盖吴起兵事件。太平真君六年，卢水胡盖吴在杏城（今陕西黄陵）起兵，响应者十余万，太武帝亲自率兵镇压，抵长安时，发现一寺院内藏有兵器，仔细搜查，还发现当地官宦富人寄存的财物与匿藏的妇女，太武帝疑其与叛乱有关，遂诛杀全寺僧人。崔浩乘机劝帝灭佛，太武帝进而诛杀长安沙门，焚烧寺院，毁坏佛像，诏行天下。《魏书·释老志》云：

朕承天绪，属当穷运之弊，欲除伪定真，复羲农之治。其一切荡除胡神，灭其踪迹，庶无谢于风氏矣。自今以后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、铜人者，门诛。……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！有司宣告征镇诸军、刺史，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，尽皆击破焚烧，沙门无少长系坑之。⁽²⁾

北魏太武帝灭佛后，由于后继者迅速恢复了佛教，佛教势力余灰复燃，信徒日众，至北周武帝时，灭佛事件再起。建德六年（577年），周武帝听取卫元嵩奏议，“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，扫地悉尽。融刮圣容，焚烧经典。八州寺庙出四十千，尽赐王公，充为第宅。三方释子减三百万，皆复军民，还归编户”⁽³⁾。此次灭佛，一是佛道并废，一是虽毁坏寺塔，焚烧经典，但并不屠杀沙门，只是强迫他们还俗，故惨烈程度远不如第一次。唐武宗灭法，因发生在唐武宗会昌年间，也称会昌法难。唐朝自建立伊始，便欲对佛教势力加以控制，李氏以老子为祖先，不仅提高了其家族门望，也有意抑佛扬道。但

(1)（北齐）魏收：《魏书·世祖纪》页97，中华书局，1974年。

(2)（北齐）魏收：《魏书·释老志》页3034—3035，中华书局，1974年。

(3)（隋）费长房：《历代三宝记》卷一〇；《大正藏》卷四九，页94中。